



Dynatoi
and Land

尹忠海 ©著



权贵与土地

——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

马其顿王朝无疑是拜占庭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它是帝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王朝，是其两大黄金时代之一。本书旨在分析军事权贵、教会权贵、世俗权贵等群体之间围绕着权力和土地两大资源所展现出的互动关系，分析皇权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主导能力，进而分析这一互动关系对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人民出版社



Dynatoi
and Land

权贵与土地

——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

尹忠海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杨美艳

版式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尹忠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9099-3

I. ①权… II. ①尹… III. ①马其顿王朝(867~1057)—历史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849 号

权贵与土地

QUANGUI YU TUDI

——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

尹忠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8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099-3 定价:4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教育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中世纪拜占庭立法文献研究与评注》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王朝时期（867—1057年）迎来了拜占庭历史上的盛世^[1]，也历经了它的衰亡，其由盛及衰的临界点为1025年，即著名的对保加利亚战争胜利者瓦西里二世皇帝去世时。867年，在拜占庭帝国经历了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的“辉煌”、希拉克略时期（610—711）的暗淡无光^[2]和破坏圣像时期及其后续期的内忧外患之后，农民马夫出身的瓦西里篡夺了拜占庭皇权，确立了他的家族统治，拜占庭一步步走上其政治、军事、立法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其实，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及其政治的新发展并非发端于马其顿王朝，而是在阿莫里亚王朝的末代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时期，虽然这个被称为“醉鬼”的皇帝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但他手下的重臣巴尔达斯（也是他的叔父）、文化巨匠佛提乌和向斯拉夫人地区传播福音的卓越使徒君士坦丁（即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却为马其顿时期帝国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1] 见 G. Ostrogorsky, *A History of Byzantine State*, trans. J. Hussey (Oxford 1968), 该书以“拜占庭的黄金时代”这一标题，概括马其顿王朝(867—1025)盛期的历史特点(原书第187页)。而就文化发展的辉煌程度而论，学者们认为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庭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 the Press of Wisconsin University, 1961. vol.1 p.126.)

[2] 拜占庭历史研究中一般把希拉克略时期视为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因这一时期拜占庭陷于对波斯和对阿拉伯的长期战争中，历史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稀缺。见 G. Ostrogorsky, *A History of Byzantine State*, trans. J. Hussey (Oxford 1968), p.79.

其主要表现是：拜占庭从破坏圣像运动引发的危机（包括其国内的困境及其与西方世界的代表罗马教皇的对立）中走了出来，意味着抵制了对基督教一统世界威胁甚大的“东方”（即伊斯兰教的）影响，成为纯粹的希腊—基督教帝国。经历了与西方罗马教廷的毫不退让的斗争，即所谓“佛提乌斯分裂”，俗人出身的著名学者、政治家佛提乌斯坐稳了君士坦丁堡教宗的宝座，东方基督教会的独立性更趋明显。随之而来的，是大摩拉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在著名的斯拉夫人使徒君士坦丁兄弟积极推动下陆续皈依了东派基督教。这一结果是极其有意义的，一方面，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有了自己的文字，此即君士坦丁兄弟依照斯拉夫语的发音用希腊文字母创立的所谓“教会斯拉夫语”，推动了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启蒙和文明发展；另一方面，这两位使徒在巴尔干半岛的积极传教工作扩大了君士坦丁堡教宗的管辖范围，使之凭借其更多的信徒和更广阔的教区来与罗马教廷相抗衡，加速了东西方教会分离的历程。最后，把阿莫里亚时代所取得的政治和文化复兴推向高峰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瓦西里一世和他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

虽然，西方史学界的拜占庭研究者们大都强调马其顿时期的辉煌，称之为拜占庭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内不多的学者^[1]也未曾否认过这一点，然而若细细品味，所谓的“黄金时代”或者“辉煌”其实只是罗马—拜占庭帝国往昔光芒的重现，很难与君士坦丁及查士丁尼时代相比。

首先，就其领土疆域来说，马其顿时代的领土范围，向西没有越过意大利的西西里，向东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向北非但没有突破多瑙河、反而越来越局促于今天希腊的马其顿省外沿，现今马其顿共和国与保加利亚一带（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末期，帝国的北疆推向了多瑙河流域，随着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这种控制就不复存在了）；向南，则无法真正稳定控制爱琴海上的克里特、罗得和塞浦路斯岛，更难说达到埃及和北非了。

[1] 即使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拜占庭研究日益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范围内的关注点，但真正从事拜占庭研究的学者比较从事世界史其他学科的学者而言，仍然是少数，笔者是这少数中的一分子。

其次，就其皇帝权威来说，由于军区制的确立，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大大发展，军事权贵势力对皇权的觊觎甚至僭越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纵观马其顿时期的历代帝王^[1]，虽然保持了表面上的家族世系，但多数时候以共治身份掌权的却是世俗贵族或者军区权贵。如瓦西里一世是农民出身，篡位称帝；其子利奥六世时期的真正掌权者是他的最后一任岳父、瓦西里时期崛起的权贵斯提利亚努斯·扎乌奇斯^[2]；到马其顿的第三代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时期（913—959年），与皇帝共理国政的是皇帝的岳父、著名大将军罗曼努斯·雷卡平（919—944年）；及至下一代君主罗曼努斯二世不幸早夭后，年轻的皇后塞奥法诺被迫下嫁屡建战功的大将军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确立了后者的皇权，往昔的历史重现；在尼斯福鲁斯被害之后，下一个谋逆篡位者约翰·齐米西斯（969—976年）仍然是著名的军事权贵家族成员；到马其顿王朝末期，著名的保加利亚屠杀者瓦西里二世和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八世死后，靠着一位皇室公主——奥古斯塔^[3] 邹伊的联姻，先后有三位权贵成员登上皇帝宝座，他们分别是罗曼努斯三世（官僚贵族成员、1028—1034年）、米哈伊尔四世（能征善战的将军、1034—1041年）和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官僚贵族、1042—1055年），马其顿家族的皇统又维持了28年。最后，这个王朝于马其顿家族的最后一位公主——奥古斯塔狄奥多拉（1042，1055—1056年）统治时寿终正寝。尽管如此，马其顿王朝还是靠着瓦西

[1] 如果从其兴衰起落的角度来考察，该王朝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867年新王朝的政权巩固时期（867—912）；强盛及向外扩张时期（912—1025）；瓦西里死后以皇族女子为血缘传承媒介的衰落时期（1025—1056）。

[2] 利奥六世曾经有四次婚姻，并因其第四次婚姻与君士坦丁堡教宗有过激烈的对抗。此处斯提利亚努斯是他的最后一个妻子佐伊的父亲。见 G. Ostrogorsky, *A History of Byzantine State*, trans. J. Hussey (Oxford 1968), p. 215. 亦见陈志强译本《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关于斯提利亚努斯本人的出身和主要经历，见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repared at Dumbarton Oaks, Alexander P. Kazhdan edited in chie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Vol. 3, p. 2220.

[3] 奥古斯塔是拜占庭皇室女性的特别封号，适用于皇后、公主（包括皇帝的女儿或者姐妹）或者太子妃，只有拥有这个封号的女性才有资格问鼎国家权力。见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里一世之血缘传统^[1]承继下来，主政在20年以上的统治者占据了全部统治者的64%左右^[2]，政权基本稳固。

其三，就其立法与精神文化发展成就来说，马其顿时期基本上是对古典时期希腊文化成果的整理与反思，很少有真正的创新，但在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中，它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无论是瓦西里一世即位初期所编辑的《法学手册》(*Prochiros Nomos*, 870—889年)、其统治后期的《法学导论》(*Epanagoge*, 879—886年)还是他的后人利奥六世时期编定的《帝国法典》(*Basilica*)都十分清楚地申明，编纂所有这些法规集成的目的，就是要“净化古法”、将查士丁尼法典希腊化。^[3]但这些法典基本上做到了在保留查士丁尼时代立法原则的同时，根据社会现实做出相应的删节和改动，为后人留下了可参照执行的希腊文法规集成。虽经过上千年的磨难、通过多种法律文献的转载和引证，上述立法文献最后保留下来的文本不到原典的2/3，尽管如此，但它们毕竟在9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发展中起到了维护帝国法制传统、调控各时期不同阶层民众的经济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文化发展方面，马其顿时期不乏优秀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但其历史作品仍然承袭查士丁尼时代的传统，形成两类模式，一类是以仿古为特征的世俗历史编纂学，另一类是以民间语编写的修道院编年史学。皇室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在智者利奥六世时期和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留下了突出的痕迹。贵族精英中，9世纪多才多艺的学者、政治家佛提乌与10世纪狡诈精明的政治家、学者普塞留斯当认为是马其顿时期文化的领军人物，前者以其《图书集成》(或译成《千卷书集》)，弥补了后人研习古典文化时缺乏原典文献的空缺；后者因其对柏拉图哲学和古典艺术的高深造诣，成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所崇拜的文化先驱者。^[4]此外，这一

[1] 如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所说：马其顿时期的民众强烈地要求皇家血族的正统继承原则，甚至不排除女性。见 G. Ostrogorsky 前引书第 289 页。

[2] 参见本书第 345 页。

[3] 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2—434 页。

[4] 同上书，第 481 页。

时期东西方文化之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文学作品则代表了拜占庭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其典型代表作是大马士革的约翰所著传奇小说《巴尔拉姆和如瑟弗》以及其内容和形式堪与西方骑士文学比肩的民间叙事诗《瓦西里·迪吉尼斯·阿克里特》。可惜，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几乎是“后无来者”。随着马其顿王朝的衰落，以及整个拜占庭帝国的衰落，这种新奇有趣、令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很难在后期拜占庭的文学遗产中再现。

恰如美国学者沃伦·特里高德所言：“拜占庭学者对古典著作的新研究并没能有效地激发他们以杰出先辈作为学习榜样的力量，反而令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而陷入绝望之中。受到最好教育的拜占庭人特别喜欢模仿古希腊语的写作形式和语法，然而不论他们模仿得好坏，结果却总是令人觉得夸张和造作……”^[1] 这话也能较好地概括拜占庭的文学创作风格。

在建筑和造型艺术方面，马其顿时期似乎也没有产生像查士丁尼时代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的标志性代表作。当然，瓦西里一世对历经地震破坏的圣索菲亚教堂进行了修缮，使它保持了拜占庭经典建筑的地位。但是，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城的规模却远远超过了罗马，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枢。其“热闹而繁华的港口和市场，支持着被公民的骄傲所联系起来的情绪多变的人民”^[2]。在微型艺术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至少，在破坏圣像的飓风^[3]卷走了诸多呆板的教堂圣像之后，生动活泼的、反映人们现实生产和生活的各类编年史、历史及传记作品中的彩色微型插图，教堂里陈列或悬挂着的各种镶嵌画、木雕和象牙雕艺术品，人们生活中、特别是皇室和贵族精英阶层所喜好的精美丝织品上的图案等都突显了东方风格与西方风格的结合，而且有更鲜明的世俗艺术色彩。

[1] 转引自崔艳红译：《拜占庭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2] 引自徐家玲译：《全球通史·诺曼狂飙》（美国时代生活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7页。

[3] 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对破坏圣像运动的严酷性和广泛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破坏圣像运动仅限于取缔陈设在教堂内的圣像和不恰当地崇拜圣像的传统。这种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见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但是，从基督教会的发展史上来看，9—11世纪的拜占庭却有其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即：经过了以破坏圣像运动和“佛提乌分裂”为主要内容的严重摩擦之后，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教宗为核心的东方基督教会日益淡出罗马大公教会的视野，为1054年的所谓东西方基督教会的“最后分裂”准备了条件。从地域文明研究的角度，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罗马世界”从此分化为西欧基督教世界、东方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1]；拜占庭从所谓“地中海文明的代表”退化为希腊化的“东方基督教会的代表”，“拜占庭文明”的希腊化特质更加明显。诚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国民直到1453年都没有放弃“罗马帝国”、“罗马人”的称呼，但是，就其实质来讲，它已经完完全全演变为以希腊民族和希腊化的东方民族为主体的区域性帝国。在上千年多方面受敌的复杂环境中，拜占庭找不到新的发展机遇，大一统的“地中海罗马帝国”如同“明日黄花”，在战火硝烟中化为乌有。马其顿王朝，对于拜占庭来说，恰是远离帝国之梦的时期，在迷茫中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向没落。于是，对于导致马其顿王朝之衰落的各种社会因素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正是本书（《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作者从事研究的出发点。坦言之，这一切入点恰到好处地抓住了马其顿时期兴衰起落的关键问题。

马其顿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权力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一种能支配其他资源的资源；土地则是中古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因而，不同利益取向的社会群体往往竭尽全力地围绕这两种资源或协调、或合作、或冲突、或斗争。《权贵与土地》一书不拘传统的史学叙述方式，只以年代学或者王室更替过程作为纵向的线索，作者以文本研究、特别是马其顿时期各代立法文献的解析为主要依据，专注于考察不同类型的权贵群体在争夺土地资源斗争中的不同立场和不同态度及皇室的政策导向，突出这种冲突与斗争背后的权力制衡机制，亦即法律和制度上对君主权力所提供的

[1] 如果说，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的征服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完成了地中海文明圈的第一次分裂，那么1054年所谓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分离，就是地中海文明第二次分化的界碑。

保证，从而立体地、多视角地解析了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时期兴衰起落的深刻社会原因。

该书没有拘泥于按照年代学的线索去勾勒马其顿王朝世系更替的过程和各时期的政权转换方式，而是强调了历代君主权力转换的制约性因素——即社会已经认同为不可变更的家族血统原则，这是马其顿家族能够多次战胜大权旁落的危机，总能转危为安地回复到所谓“皇室正统”道路上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马其顿王朝始于一个农民出身的重臣的篡位，亡于一个女性继承者的正常死亡。作为篡位者，瓦西里一世在王朝兴起之初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新旧权贵的冲突中、在权贵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激烈矛盾斗争中把握平衡，保住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既得权益。他认为：“保持一个国家稳定的最重要前提，是使权力有秩序地从一个皇帝手中传给一个与他思想感情相似的家庭成员。而这种国家的稳定在拜占庭世界是最值得重视的标志。”于是，他对罗马教皇的妥协，对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对东方边界之阿拉伯入侵者的有力回击，对自己认同为正宗的、但却没有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的长子的特别宠爱^[1]，都是在致力于确立自己家族的长期稳固统治。^[2] 同样，瓦西里一世并不喜爱的儿子利奥六世，也没有放弃他父亲曾经视为经典的家族原则，为了保证自己的非婚生子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保守的君士坦丁堡教宗对抗，强制迎娶了自己的第四任新娘。这种家族政治原则的正统性在马其顿王朝的后继君主统治时期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君士坦丁七世的岳父、著名的将领罗曼努斯·雷卡平，曾以年轻皇帝的共治者统领内外政治，得到拜占庭人的拥护，但他的儿子们想篡位乱政、取而代之时，他的整个家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又如，当奥古斯塔身份的佐伊多次招婿使之继承皇位时

[1] 瓦西里一世先后有四个儿子，只有长子君士坦丁出自他的结发妻，而次子利奥、三子亚历山大和四子斯蒂芬，是他和前任皇帝米哈伊尔三世的情妇结婚后所生，出于保持家族纯净血统的需要，他特别宠爱自己的长子，寄予厚望。但长子的不幸早夭，使其梦幻破灭，悲痛欲绝，也使他统治的最后七年缺少了当年的活力。见徐家玲译：《全球通史·诺曼狂飙》（美国时代生活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2] 见徐家玲译：《全球通史·诺曼狂飙》（美国时代生活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期，拜占庭人并不曾反对她，尽管她执政期间有诸多弊端，但是，当她的倩夫米哈伊尔五世想取而代之时，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拜占庭人所遗弃……于是，马其顿王室家族的血缘联系，是维护其政权长期稳定的重要链条，而在1025年之后，该血缘原则多次面临严峻挑战、权力中心的统治风格亦出现了继承断裂，最后是皇统后嗣绝续，马其顿王朝自然死亡。

接下来，巩固权力的宗旨决定了各代帝王的政策导向，篡位者瓦西里一世曾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刻了解拜占庭地方政权对农民和各类劳动者巧取豪夺的弊端，因此，他对税收的调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利奥六世为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获得世俗精英的支持，更有力地对抗教权，亦制定了既有利于权贵利益、又可稳定国家财政局面的土地交易敕令。出自军功集团、借着军区制的完善进入社会顶层的罗曼努斯·雷卡平则以规范土地交易、打击土地兼并的政策致力于保护军农利益，维护国家税收机制，削弱新兴权贵势力，从而巩固了军区制基础，使国家顺利渡过灾荒等困境，国家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在权力中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如何约制不同权贵群体自然十分关键。该书的横向分析，综合运用了多种原始资料，包括马其顿王朝诸帝颁布的14个关于土地问题的立法文本、2份修道院院规、历史编纂文本和民间流传的史诗等，以军事权贵、教会权贵、世俗权贵等不同集团中的精英为个案来说明上述问题。军事权贵方面的典型代表自破坏圣像时期就已经存在，到马其顿时期已渐成气候的封疆大吏，或称边境领主，史诗《狄吉尼斯》以文学手段，描述了拜占庭东部边疆领主们的生活方式及割据一方、游刃于阿拉伯人与“罗马人”之间的特殊地位。^[1]而“两巴尔达斯叛乱”^[2]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经此巨变，瓦西里二世颁行了O令，试图通过规范土地资源来约制权贵，维护国家税收基础。教会权贵们，则不

[1] 对于《狄吉尼斯》史诗的文本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玲俐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与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社会》（[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5）中做过有益的探讨，虽然她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但多少勾画了狄吉尼斯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封疆大吏的权势。

[2]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同于世俗权贵，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带有某种精神升华的成分。虽然拜占庭的修道院一向有着巨量的土地，但并不妨碍某些道德洁净主义者标榜廉洁，或者一些权力现实主义者追逐权力。皇帝们也能巧妙地借助宗教的道德说教，强化中央权力：在诸多土地立法条文中，道德作为权力合理性的塑造力量昭然于字里行间。在世俗权贵方面，包括行政官僚、阉人集团、知识精英在内的不同势力在帝国晚期也无视国家兴衰，积极参与了土地兼并的竞争。著名学者、政治家普塞留斯虽然也承认并指责权贵们对国家财富的侵吞导致国库空虚的行为，但却深知自己无力补天，私下里劝自己的门生们多购置土地^[1]。知识分子的道德取向显然已经成为帝国衰微的表征。

虽然帝国对分离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但是权贵们挟财富优势、等级优势、人际纽带优势、法律诠释优势、职权优势等与中央相抗衡，其贪婪之甚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博弈手法当中。因而，从文本分析看来，许多土地立法难免有滞后之嫌，中央对权贵打击亦多有顾虑。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立法者的取向未必与国家利益一致，如尼基弗努斯所颁行的法令^[2]。如此一来，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些土地立法措辞十分严厉；另一方面，另一些敕令等立法活动又鼓励特权，比如修道院所获得的特许权。在此背景下，虽然有马其顿王朝的统治者焦虑地指出，贫贱者在沉重地哀叹，但是作为弱势一方的贫贱者并不总是只有哀叹、只有起义，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的生活策略和对抗策略，比如逃离、寻求庇护、合谋、规避、诉讼等等。

在纵横交错的明线当中，一条暗线始终蜿蜒于全书当中。这条暗线就是权力—制度。马其顿王朝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保持了强大的自我巩固、自我纠错、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一机制当中，制度是最为关键的力量。然而，制度本身“内嵌着自身灭亡的基因”^[3]，因为它是一种悖论式

[1] 这一观点来自英国拜占庭学者迈克尔·杰弗里斯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他是以研究普塞勒斯个人书信集的方式揭示了这个人思想、行为和学术著述中的贡献，在此谨表谢意。

[2] 关于尼基弗努斯立法的矛盾性，可参阅本书第321—324页。

[3] 参见本书第357页。

存在。比如，军区制在 7—10 世纪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军事领地成为帝国分配资源的杠杆；到 11 世纪，这一制度的绩效达到顶峰，其后该制度逐步走向衰败。设计军区制的本意在于巩固皇权，但是，那些积蓄了足够实力的军事首长们又往往成为僭越皇权的最大威胁；于是，英明神武的皇帝们积极确立而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皇权血缘的承袭，以遏制权贵们的野心。再如，拜占庭国家机器的运行是依靠科层制色彩浓厚的地方官僚阶级，但地方官僚们一旦获得了权力，总是无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因此，需要法律的惩戒。在这方面，应该说，拜占庭马其顿时期历代皇帝的立法多多少少起到了抑制地方官僚和割据势力的作用，但反复颁行的法规及越来越严厉的惩戒措施，恰恰说明了这些拥有重权的权贵们，其势力一旦膨胀，即不可遏制这一典型特点。于是，当地方政权已经完全被权贵所控制之时，拜占庭的中央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瓦解了，一个由权贵代表组成的新王朝——科穆宁王朝，也难挽狂澜于既倒，拜占庭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的深渊……

徐家玲

2010 年 5 月 30 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2
(一) 国外文献综述	2
(二) 中文文献综述	21
第二节 基本术语、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26
(一) 权力与土地	26
(二)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33
第二章 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转型	41
第一节 新兴强权与帝国变迁	41
(一) 伊拉克略改革	42
(二) 地缘压力下的生存与变革	48
第二节 力量复苏与阿莫利王朝遗产	54
(一) 反攻时代的到来	54
(二) 孕育中的新时代	58
第三章 新旧贵族的角逐	65
第一节 篡位者与权力合法性	66
(一) 从士兵到皇帝	67

(二) 向上流动之后	71
第二节 利奥六世: 权力集中与精英沉浮	81
(一) 权力集中与法制完善	81
(二) 关于土地交易的敕令	87
(三) 重葬米哈伊尔三世	91
(四) 命运沉浮的弗提乌斯	94
第三节 皇权延续与贵族弄权	99
(一) 罗曼努斯家族的悲剧	100
(二) 走出军阀时代	105
第四章 经略边疆与军事权贵	109
第一节 经略边疆与军区制演变	110
(一) 关于军区制的论争	110
(二) 文明交往、资源配置与等级关系	113
(三) 史诗中的边疆军事权贵	126
第二节 罗曼努斯的制衡策略——土地法令 之比较	134
(一) 从利奥六世新律到 B 令与 C 令	135
(二) 934 年新律的特征及其社会背景	140
(三) 罗曼努斯土地立法活动的评价 ——以 C 令为例	145
第三节 “两巴尔达斯叛乱”	150
(一) 两个举足轻重的权贵家族	151
(二) “两巴尔达斯叛乱”背后的家族关系	153
(三) 瓦西里二世性格的转变 ——普塞留斯的视角	156
第五章 特权与教会权贵	163
第一节 马其顿王朝的教权与皇权	164

(一) 土地及其产出被裹挟：上帝立王与 百姓之治.....	164
(二) 恺撒教权主义争论	167
(三) 马其顿王朝兴盛中的宗教因素	173
第二节 利奥六世的婚姻与教权	180
(一) 利奥婚姻的合法性困境	180
(二) 第四次婚姻与利奥的危机处理策略	188
(三) 皇室婚姻、权力分配与教会利益	193
第三节 修道院：道德、权力与土地	197
(一) 里拉修道院：让道德像荒野一样洁净	198
(二) 阿塔纳修斯：权力关系网络中的 资源获取者.....	202
(三) 阿索斯山的羊皮卷教规： 权力斗争与土地问题.....	214
第六章 世俗权贵的挣扎	223
第一节 世俗权贵的构成及其案例	224
(一) 《狄吉尼斯》中的埃米尔及其家族归附	224
(二) 阉人布林伽斯弄权的失败	230
(三) 教育与官僚权贵：普塞留斯身边的 知识精英.....	237
第二节 世俗权贵与 1025 年前后的内忧外患	242
(一) 吉本的刻薄与安高德问题	243
(二) 对瓦西里二世统治的再思考：形象与实践	248
(三) 世俗权贵与继承断裂：1025 年后的概况	257
第三节 军事权贵的短暂崛起	266
(一) 军事权贵不断面临挑战	267
(二) 地缘重构与巴尔干—意大利边疆乱局	275
(三) 改革失败与地缘压力的共振	278

第七章 斗争与冲突：国家协调的绩效	285
第一节 皇权与国家的非一致性	286
(一) 皇权家传与制度悖论	286
(二) 边疆变迁与制度整合	293
(三) 特许权与皇权之局限	299
第二节 权贵博弈与土地立法活动	306
(一) 博弈的多样性与立法的针对性	306
(二) 权贵优势与立法、执法之困	311
(三) 立法者的取向——以尼基福鲁斯为例	317
第三节 贫贱者境况与土地法令评价	324
(一) 贫贱者在沉重地叹息	324
(二) 贫贱者的抗争与生存策略	328
(三) 关于立法活动的评价	333
结 语	343
(一) 马其顿王朝兴衰的原因	343
(二) 群体、资源与制度	354
参考文献	361
附 录	379
附 A：马其顿皇帝一览表	379
附 B：各章图表查核一览表	380
后 记	381